

热血青年投革命 干部大队援西北 (二)

——西北局举办回族干部培训班始末

拜学英

学校重视建团工作,于4月中旬召开了第一次团员代表大会,蒋南翔作了关于团章的报告,并通过了团章,冯文彬作大会总结,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

学校共招收了四期学员,1949年8月8日第一期培训班1.2万余学员毕业,1950年3月11日第二期毕业。1949年11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培训班历时6个月,1949年8月8日举行了毕业典礼,副校长刘澜涛讲话,对华大性质作了概括:“天下的大事莫过于革命工作,而华大毕业生却个个都做革命工作,华大之所以谓之大,就是这个缘故。”在毕业典礼上,朱德总司令要求大家:“西北、西南解放神速,那里需要干部去接管。同学们毕业后多数要分配到南方和西北去,这是最光荣的任务,你们随军前进,到新解放区去工作,解放军打到哪里,你们就工作到哪里,在哪里生根。”

西北干部大队的组建及奔赴西北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军政大学、南下工作团等在京的学校,按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总体部署,对各自招收的青年学员经过3个月至半年不等的培训,使学员们武装了头脑,提高了觉悟,增长了知识,加深了友谊,树立了为人民服务思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深了认识和理

解,对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充满信心,对新中国的前途充满希望,滋润了学员们的心灵,开阔了学员们的眼界,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得以初步树立。正如校刊《熔炉》刊名一样,学校是一座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旧思想的革命熔炉,每个人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有的学员在培训期间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的还加入了党组织,思想觉悟和理论素养均得以提高,成为维护新政权的新生力量。学员们充满了革命激情,“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学员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愿望和抉择。

按照中央和西北局的考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经过短期培训毕业的青年学员将组成南下工作团和西北干部大队,学员根据自己的愿望和情况自愿选择。于是,1800人组成西北干部大队选择西进,而更多的学员随工作团南下到南方新解放区开展工作。在各学校参加培训的98名回族青年选择少数民族较多的大西北,随西北干部大队西进。西北干部大队编为3个队,在等待西北局接的几天里,又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西北局对西北干部大队西进非常重视,派西北局组织部干部何戟前来北京迎接这批干部,并举行了西北干部大队成立授旗仪式。

1949年8月10日,由1800人组成的充满着革命激情的队伍——西北干部大队从刚解放不久的古都北平出发,奔赴大西北,大家同声唱着“去,去,去,到西北去,到西北去,到西北去!我们是新中国的优秀儿女,哪管它山高路

远,黄河水又深,大踏步向前进,西北的人民期待我们……”西北干部大队的学员集聚在北京前门西车站,依次登上铁皮货车,整装待发。“到大西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口号在车站及站台上响彻,学员们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活力。学员们有毕业学校领导欢送的,也有父母亲到车站送别的。

西北干部大队的学员们穿着灰色军装,背着军用水壶,坐上了离京的火车,经天津、沧县、德州、石家庄,到山西榆次后,又乘轻轨火车到灵石后步行,途经介休、平遥、霍县、解县,到风陵渡改乘船过黄河,抵达潼关后再乘火车到西安。

在1800余人组成的西北干部大队里,有98名回族学员从北京出发时,分别编在3个大队里行军。为方便行军途中吃饭,西北干部大队到山西榆次短暂休整时,将98名回族学员编成一支分队,贾春光任分队长。这些回族学员们深知大西北是回族比较集中的地方,饱经苦难的回族人期盼着翻身解放,学员们对“打到西北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更多了几份情感。

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9年9月18日在西安新城广场召开大会,热烈欢迎西北干部大队的到来,时任西北局书记仲勋说,你们来到西北,今后西北就是你们的家,你们要在这个家庭里过好光景,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家庭里的一切实际情况,并且团结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大家要有广泛的适应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希望大家团结群众,注重实际,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随后安排学员们观看了三易社演出的秦腔《红娘子》、歌剧《刘胡兰》等。



宁夏党史大事记 (十)

邢万莹

1933年12月 中共绥远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到河套视察工作,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原名谷景邛)向特委请求到宁夏开辟工作。刘仁表示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请示后再作决定。

1934年1月 孙殿英部攻占石嘴山,与宁夏旅平学生会早有联系的地方人士李冲和、叶松林、贺闻韶等在石嘴山会见了孙殿英部中共党员南汉辰、刘继曾,商谈动员地方力量,组织地方维持会,筹集粮草,支援孙军问题。孙殿英部给地方武装梁绍武、刘复统部100余人配发了枪支。

1934年2月 中共党员赵子明被马鸿逵部强行征兵,给伤员治病,并被委任为上尉医官。赵子明利用给伤员治病机会,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党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介绍马英才旅上尉副官雷鼎三和上尉译电员尹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子明在省城站稳脚后,便设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要求派人来宁夏省城开展工作。

1934年4月 在“孙马大战”中,由于马鸿逵、马鸿宾与青海马步芳、马步青联合抗孙,孙殿英部大败于宁夏省城。孙殿英通电下野,离开部队。孙部的中共党员南汉辰、刘继曾等人先后离开宁夏;李冲和、谈尚彦等当地人也潜出宁夏去北平。宁夏旅平学生会利用孙马之战,建立宁夏地方武装的计划也随之落空。

1934年4月 原中共临河县委书记王森向中共绥远特委组织部负责人刘仁汇报了赵子明在宁夏省城的工作情况,并提出迅速派人到宁夏省城开展工作。

宁夏革命英烈

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 (下)

邢万莹

崔景岳从一些在艰苦环境中脱党叛党的行为中,看到了党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以及对党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除了重视和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外,还注意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他人。为了保存体力,坚持到斗争胜利,他带头吃霉味熏人、有老鼠粪和沙粒的饭食。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促使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馍馍、饼子,让大伙充饥。

冬季,阴湿的牢房寒气逼人,崔景岳主持召开狱中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衣着单薄的难友过冬。会议确定捻毛线织毛衣,自己又东拼西凑,共凑了20几块钱,托人从外面买回了10余斤羊毛。难友们齐心动手,很快大家都穿上了毛袜。随后,衣服单薄的同志又穿上了毛衣、毛裤。多余出来的毛衣,他们还托人捎出去变卖。这样,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

“监狱热”开始流行,有些同志先后染上了这种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马云泽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并与大伙合计,全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战友。

为了锻炼身体,崔景岳在刑伤严重、步履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难友们做“狱中早操”。早操完毕,组织大家学习狱中仅有的书刊。崔景岳自觉文化程度低,还主动请孟长有给自己教数学。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崔景岳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他却漠然置之,仍然团结全体难友与敌人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同志们都亲切地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

马鸿逵为了争取宁夏地下党负责人自背叛变,授意特务高中第、马孝贤,最后一次找

崔景岳“谈话”。特务头子马孝贤,对崔景岳说:“我们马主席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在哪里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认错,马主席让你当大官!”“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崔景岳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回答对方。“这是给你最后一次认错的机会,现在认错还不晚。崔景岳,你心里要放明白些!”两个特务自以为这句话一定能唬住崔景岳。“我没错,向你们认什么错?!”崔景岳大义凛然,坚定地说。

特务马孝贤、高中第将谈话情况向马鸿逵作了汇报。马鸿逵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1941年4月17日深夜,突然监狱门上的铁锁被打开了,特务头子高中第走进关押崔景岳的号子,尾随进牢房的狱卒高喊:“提崔景岳、孟长有!”难友们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约而同紧紧地围住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知道生命的最后时刻来到了,从容镇定,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

刚出牢门,崔景岳停下来,解开棉袍扣子,脱下了棉袍。高中第走上前来,假惺惺地说:“天气冷,穿上吧!”“我只冷这一回,他们更需要!”崔景岳转过身,抱着棉袍走向牢房。狱中的同志们伸出双手接过棉袍,含泪目送亲爱的战友。

崔景岳身上仅穿着一件单褂,一阵寒风扑来,袭击着他单薄的身躯。然而,他挺着胸,昂着头,和孟长有一起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刚走不远,敌人又从另一间牢房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

(作者系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专家)

移民岁月 第四十期

从松花江畔到黄河岸边 (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赵之班:1955年银川并到甘肃,我调到银川市妇联当干事。肃反结束后,教育界缺人,我和丈夫调到青铜峡原宁夏朔中学教学。我还担任团总支副书记,丈夫任教育主任,一直教学18年,带初中历史、语文。1967年,因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被怀疑为特嫌,这样的家庭背景,只好劳动改造。1969年学校批判旧教育制度,大家解散了。我们曾带着孩子到北京待了一年,找支左部队。一位叫史向齐的负责人为我们批了4个月工资,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了住的地方。向别人打听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反映我们的情况。办公室很快派人来了解情况,给了20块钱和30斤粮票,我没要钱,收下了粮票,给我一封信,让当地支左部队帮助我解决问题。

我从北京回来时,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同情我的遭遇,给我印了两份反映情况材料,后来分配我到大坝中学教书,我实在不愿意在这个伤心的地方待了,就向教育厅申请调动。支左部队帮我调回银川。1973年至1979年在银川三中教书,教过两年多高中。1979年我被调到宁夏日报社科技部当了3年记者编辑,多次报道高考老师阅卷。写报道写得越好,教育厅厅长就动员我回教育上,我说中学再也不回去了,他说你到大学去教书。1981年,调到了教育学院带写作课。1983年,被评为讲师。这时文凭风刮起来了,我啥文凭都没有,小学一年级的我在大学当老师,被称为世界奇迹。我既不懂英语,古汉语也只知道皮毛,没文凭,再也无法上升,但我的讲课效果好,继承了父亲的口才和清晰的头脑,反应又快。但解决不了职称,后来患上了肺气肿、气管炎、喉癌等与职业有关的疾病。当时我们学校还承担函授教育,每年寒暑假到各地级市去进行填鸭式的补课教育。学生都是文革中失去了上学机会的人,围一圈让我评讲,我每看完一篇作文,指出不足和注

意事项,肯定好的地方,有时对着范文讲,如何写出好文章来。每天讲课都超过10个小时。部队的官兵都来参加函授学习,驻宁夏空军的一位师长也来参加学习,是我的学生。我感到压力很大,有时连着上3天课,喝了3瓶止咳糖浆。1985年,一则有病,二则无文凭职称,就提前退休了。

退休后也没闲着,办了个公司搞贸易,把贺兰山造纸厂的纸卖到广州。这种纸在银川干燥有点脆,到南方因天气湿润变得柔和,南方人喜欢用这种纸,我就往南方用火车发货。我的学生帮忙联系火车,广州有人负责销售。还做过木材生意,赚了一些钱买了现在的房子。1995年我儿子成立了装潢公司,让我主管财务。早在1979年,在宁夏日报社时参加过律师业务学习,常被委托当辩护人。一共打了108场官司没输过,在平罗、左旗、青铜峡、吴忠、同心都打过官司。人家来找我,没别的理由,说我是赵铁嘴,就兼职搞了3年诉讼业务,也赚了一些钱。有钱了想起小时候卖报时,官太太吐在我脸上的情景,有时学生来找我,我就3块、5块乃至10块的给学生们一些。我至今记着爷爷说过的话,不能为自己活着,人是为别人活着的,因此要为别人做点事。我在红旗旗下成长,使我一个没学历的人当过记者、老师,还到上海华东师大进修,使我开了眼界。一个人只要有恒心,想学啥没有学不会的。如今电脑、手机我都很熟练,今年我已86岁了,脑子仍然清楚。

我与丈夫是1953年8月结婚的,丈夫叫韩文英,金积当地人,组织上安排的婚姻。我出生在东北回族家庭,东北的回族很简单,没有太多的习俗礼教,我是回族但不是伊斯兰教徒。我给儿子做了安顿,我死了你们可以哭,因为人都是哭着来到世上的,死了后在别人的哭声中又被送走,这是规律,不必那么伤心。人都得死,圣贤尚且如此,何况凡人呢。

(拜学英 李青峰 整理)

绘制宁夏发展蓝图的高级建筑师——张亮 (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张亮:195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这时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开始大量裁军,中央军委设计院被列入裁军范围,400多人的军委设计院抽调了100多人到浙江,我和20多人被调到了宁夏,被调出的全部是技术骨干和专业能力比较强的技术干部。到宁夏后先分到了自治区计委,当时宁夏还没有专门的建筑设计单位,马玉槐在宁夏当副主席时,又从北京市和甘肃省设计院调来了几十个建筑设计技术人员,成立了自治区计委建筑设计组,我当组长,所有的人都是外省来的,真的体现了五湖四海。几十人的队伍里,清华大学毕业的同学就有6位。主要任务是搞城市建筑设计。到宁夏后,独立搞的第一个建筑设计项目就是银川浴池。当时的自治区领导杨静仁、马玉槐都是从北京来的,他们在给我布置任务时说:宁夏太落后了,各方面都需要发展,但首先要给大家的卫生习惯搞好,让大家有个洗澡的地方,所以银川浴池就成为一个优先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初,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都比较落后,城市大型建筑项目少之又少,工程投资也时常捉襟见肘,所有的项目都必须精打细算,有时还必须把省钱排到第一位。外观结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都要退而求其次。1959年初,自治区党委书记杨静仁交给他一任务,就是要新建一个大型电影院。

张亮:红旗剧院的设计时间很紧、任务很重。因为想在第二年10月在剧院召开自治区成立一周周年庆祝大会。与普通电影院不同的是,红旗剧院除了要有放映电影的功能,还要有舞台演出设施、会议休息室,还要有增加演出功能。舞台设计还涉及了灯光、置景、美术、音响等多个专业技术领域。自治区领导在给我布置任务时还特别强调,新建的红旗剧院必须是银川市的一道风景,外观大气漂亮,内部实用。当时是自治区几个大型建设工程之一。所以我的印象特别的深,现在我还能讲出当时的设计理念、设计结构尺寸和使用的基础材料。

红旗剧院的设计和建设按期完成,给自治区领导和银川市民交出了满意又漂亮的答卷。直至上世纪末,红旗剧院还是自治区重要党政活动的主要场

所,红旗剧院建成后,时任自治区副主席的马玉槐夸赞说:红旗剧院的漂亮和实用可以让设计师自豪一辈子。随后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军区大院、护校、宁夏大学、西北煤机厂等很多项目都是他主持设计。张亮讲,所有的这些设计项目都必须围绕省钱的原则,有些让人放不开手脚。

张亮:当时宁夏太穷,大项目几乎没有,在设计宁夏人民医院门诊楼时,设计投资需要10万元,但政府只给了8万元,最后只能在新材料使用上找路子,后来宁夏在推广新材料应用上走在了全国前列,这其实也是被穷给逼出来的。因为我的文笔好,又让我参加社教,还把我调到了中卫镇罗公社搞社教。

文革后,宁夏迎来了建设的春天,工业项目和城市建设项目接踵而至,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个时期的张亮挑起了宁夏建筑设计界的大梁,担任宁夏建筑设计院常务副院长。引进了设计项目责任制、大量培养青年人,为城市建设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改革开放后,他又主持了人民银行宁夏分行、吴忠、石嘴山市人行、工商银行、吴忠、固原邮电局等项目设计,其中自治区人民银行项目还获得自治区建设一等奖。1975年,张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退休后张亮又被聘为自治区政府建设顾问,因为在建筑领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还受邀参加自治区计委、银川市计委、银川市审批服务局等单位建设项目的审查。还曾担任过自治区新建项目专家组成员和专家组组长。

我们采访时,已经90岁高龄的张老先生还在审查建筑图纸,对项目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给予技术指导,签署专家意见。退休后审阅总量达到几百份,建筑项目估值在上千亿元,提出过的修改意见上千条,大部分被采纳。堵住了一些设计项目中的技术偏差和浪费。

张亮说:我很喜欢建筑设计这个行业,喜欢建筑设计中无穷的变幻与精巧构思及彰显出的性格特征,喜欢向前沿专业技术挑战,喜欢不断创新的设计理念。对从北京来宁夏从不后悔,能为宁夏的建设倾心全力让我深感欣慰。

(拜学英 蔺银生 整理)